

〈その他〉

明朝人在名古屋

林 涛

日本語要旨

日本は中国大陸からの影響を受けながら、独自の文化を形成している。日中文化交流の歴史の中、長崎、横浜、神戸、江戸などの都市は中国文化渡来の入り口としての位置づけがある。そのような時代背景の中で、実は江戸時代に名古屋地区でも知られざる日中文化交流が盛んな時期があった。尾張藩徳川義直、徳川光友二代藩主の支援の下で、当時中国の明王朝の滅亡により、戦争から亡命してきた文化人がたくさんいた。彼らは中国の文化を日本に伝え、名古屋地区及び日本文化の形成に影響を与えた。このレポートは陳元賛、張振甫、曹数也三人の活躍をまとめた内容である。また、江戸時代の名古屋に存在した中華物産店狼屋についても考察した。市内に唐山町、振甫町などの中国由来の地名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とから、江戸時代の名古屋に相当な数の中国人が住んでいたと考えられる。名古屋は中国とアメリカの「卓球外交」の舞台でもあり、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中で、とても無視できない町でもある。

明朝人在名古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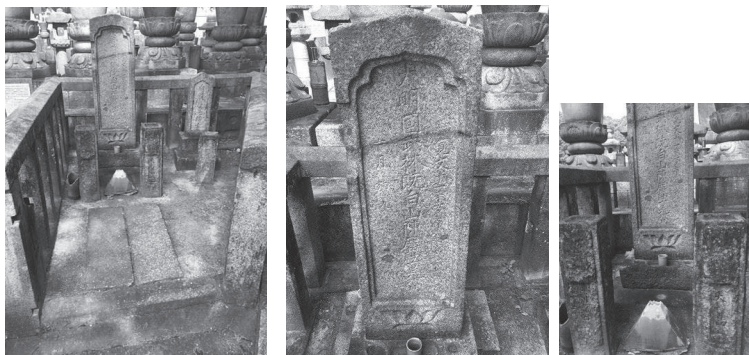
引子

2018年4月的一天，旅居日本爱知县的笔者，搭乘地铁来到名古屋市千种区的自由之丘，拜访一位同样东渡扶桑，长居此地的先人。在日本东京，也有一个出名的地名叫自由之丘，通常日本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头脑中反应出的是一个富人区的景象，琳琅满目的杂货店和甜品店，身着优雅服饰的少妇们。然而当我踏出地铁名城线自由之丘站，却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嘈杂，相反却是非常的宁静，沿着上坡路往前走，可以到达平和公园公墓。这里长眠着一位明代末年东渡日本，和当时此地的尾张藩主有着深刻友谊的贤士。由于日本国土资源紧张，日本的坟墓都只有一平方米不到，平和公园是名古屋市最大规模的市民公墓，历史悠久，现场密密麻麻，无异于大海捞针，即便是对着地图，也根本无法在成千上万的坟墓中找到这位贤人的墓地。一个小时下来，笔者已经是大汗淋漓。



非常有意思的是，行走在这片广阔的墓地，不时地耳边会传来各种乐器演奏的声音，有架子鼓，有小号，小提琴，虽然我们看不到演奏的人。但请不要误解，不是办丧事的乐队之类的，这个是岛国特有的现象。日本房子隔

音通常很差，地方小，房子挨着房子，想要练习乐器，对于异常重视邻居对自己看法的民族来说，找地方是非常困难的。于是，相比租赁费用高昂的练习场，在公墓练习便成了首选。托他们的福，长眠此地的先人们可以时不时欣赏演奏会，平和公园也成为了名古屋当地音乐爱好者的乐园。笔者也只好找到一位正在吹号的老年人问了一下，看来他是常来的，一下子就给指明了方向。



终于，费尽周折，笔者终于来到了这位贤人的墓地前。在寂静的一角，显得毫不起眼，倒是隔壁的坟墓看上去有些来头。答案正式揭晓，这位明末先人名叫陈元赟（yun 第一声）。

这个大概不到2平方米大小的墓地，如果不是旁边葬着尾张国第七代藩主德川宗春的话，估计是不会有人注意到的。墓碑上刻着“大明国武林既白山陈广学元赟”，背后刻有“既白山人遊息之处”。墓前插花用的陶质富士山花瓶，和墓碑上的“大明国”字样映衬下，显得非常特别。旁边的德川宗春墓大概有3平米大小，墓碑有3米高，在密密麻麻的坟墓群中显得鹤立鸡群。后面还有当地组织编辑的德川宗春介绍。陈元赟墓的背后，有许多外形特殊的墓碑，下面埋葬着是好几位为德川宗春殉死的陪臣。

1 本文照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拍摄。



（上图是笔者站在陈元赟墓和德川宗春墓之间，后面长得像印章一样的墓碑是殉死的陪臣们）



我们很难想象几百年前一个中国人东渡日本，然后葬在异国他乡，然后墓碑前供奉的是一个富士山外形的花器，为什么一个明朝的贤士，会葬在了日本尾张国第七代藩主的旁边？这背后究竟有怎么样的一段故事呢。

一 影响日本的明朝遗民

在揭晓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背景。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一衣带水。从公元600年(日本推古8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隋使,到后来的遣唐使,一直到现代日本社会中众多的儒教文化元素,无不体现了中华文明对日本岛国的深远影响。

17世纪中叶,中国“明清交替”的政权变动,带给了周边国家极大的冲击,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东亚海域,随之掀起波涛。战乱是造成当时中国文人东渡日本的要因,明朝灭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迫于形势,选择远离国家者众多,所谓“越境”,“迁移”蔚然成风。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中国人的越境,作品的越境与影响,将中日文化和思想交流推向空前蓬勃发展的境界。

从1639年(日本宽永16年),江户幕府禁止葡萄牙船只入港,到1854年(日本嘉永7年),日美和亲条约缔结为止,日本经历了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代。当时,对外交流仅限于中国,朝鲜,琉球和荷兰,长崎作为当时日本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也聚集了许多中国人。据当地著名的中华料理四海楼的第四代老板陈优继介绍,17世纪后半期,长崎总人口一共6万,其中竟有1万是中国人。当时的日本幕府,害怕外来的宗教影响其统治,1612年发布了禁天主教令,当时居住于长崎的中国人,为了摆脱被怀疑是天主教信徒的可能,建了4个著名的寺庙来明确自身的佛教信仰,俗称为“长崎四福寺”,分别是1620年江浙一带中国人建的兴福寺(俗称南京寺),漳州和泉州等闽南地区中国人建的福济寺(俗称泉州寺),福州人建的崇福寺(俗称福州寺),还有圣福寺(俗称广东寺)。²当时的江户幕府出于自身统治需要,积极引入中国佛教文化,近代许多中国僧侣无形中充当了中华文化传播使者的角色。

2015年5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中国国家主题习近平说:“我在福建省工作的时候,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

2 数据来源于长崎兴福寺主页<http://kofukuji.com/contents.php?contID=1>

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³

这位隐元隆琦禅师是江户时期长崎兴福寺的住持,中国福建福清人,对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成就。隐元禅师传播佛法,为当时日本的禅界临济,曹洞二宗的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是日本禅宗黄檗宗的始祖。饮食文化上,开创了煎茶道,将中国的菜豆引入日本,至今日语中菜豆发音为“隐元豆(インゲン豆)”,同时也是日本普茶料理,日式小点心寒天的创始人。除此之外,在印刷术,书画,开创日本图书馆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贡献。



4

17世纪中期,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崇祯皇帝自尽于煤山。满清入关,大举南进。南方许多士族拥护皇族,成立南明政权,力图反清复明。郑成功家族几代人多次派遣人员抵达锁国政策下的日本,请求幕府出兵挽救南明政权,史称“日本乞师”运动。著名儒家学者朱舜水也负命抵达长崎,之后受聘于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移居江户,对后来的“水户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这两人之外,也有许多中国文人,东渡日本,影响了德川幕府社会的文化发展。笔者对这一群体进行总结,主要有以下表格中的这些人。⁵

3 新华网2018年5月23日《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全文)》第5段落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115384379.htm (2018年8月25日查阅)

4 图片来源于京都万福寺主页 <http://www.obakusan.or.jp/oubaku.html> (2018年8月13日查阅)

5 笔者根据台湾大学日文系主任,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徐兴庆2016年8月3日论文《影

人物	年代	籍贯	主要贡献
陈元明	16世纪中期	江苏扬州	建筑
陈元赞	1587-1671	浙江余杭	武术，书法，绘画，诗词，建筑，医术，制陶
隐元隆琦	1592-1673	福建福清	宗教，饮食，书法，篆刻，印刷
陈明德	1595-1674	浙江杭州	医术
朱舜水	1600-1682	浙江余姚	儒学，哲学思想
俞立德	17世纪中期	浙江杭州	书法
独立性易	1596-1672	浙江杭州	诗词，书法，医术，篆刻
张振甫	1629-1680	待考	医术
东阜心越	1639-1695	浙江金华	宗教，儒学，书法，篆刻，诗词，音乐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朝遗民东渡日本，主要是文人和僧侣。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研究，明末清初，东渡日本的中国文人多达百余人。又据《日本佛教史》统计，德川时代元禄年间（1688-1704）东渡日本的中国僧侣也多达50余人，其中不乏学者，思想家，艺术家。⁶

从籍贯上看，可以看出，浙江，福建等江南地区居多，笔者认为集中于江南主要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明末清初，和日本贸易外来比较频繁的是当时的明州港，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港，在远行主要靠船只的年代，南方地区较为发达的航海技术也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是很关键的原因。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明朝时期，江苏，浙江，福建等江南地区，学问之风盛行，诞生了许多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表现突出。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张台湾地理学者陈正祥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册》中的明代进士出身地分布图可以看出这一现象。

7

响日本的明朝人》一文，加以添加列表编成。原文网址（2018年8月13日查阅）：
<http://elearning.kmfa.gov.tw/2016WanLi/影響日本的明朝人-徐興慶.pdf#search=%27%E9%99%B3%E5%85%83%E3%81%B3%E3%82%93+%E5%BE%90%E8%88%88%E6%85%B6%27>

6 来源同注解4，参考了文章的结语部分。

7 【近世東アジア黒潮圏交流国際共同研究会報告書】平成17年—21年度 文部科学省科研費補助金特定領域研究 2008年5月 35ページ 濱島敦俊執筆部分

当时日本的儒者，汉学家争相到长崎游学，把能饱食中国学艺为毕生的荣耀，各藩诸侯也积极礼遇东渡日本的中国文人雅士，他们倾心汉学，爱好中国典籍，诗词，绘画，书法，德川时代是日本空前的汉学兴盛时期。

二 名古屋在中日交流史上的地位

明末清初，中国人在日本的活动基本在长崎和江户地区。从长崎进入，然后奔往都城江户，千年古都京都也常有中国人出没。其他地方城市，和以上中心城市相比，中国人人数是非常少的。然而，在这个背景下，笔者注意到，位于长崎和江户之间的名古屋，事实上在明末清初时期也出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国人活跃的小高潮，也在中日交流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

名古屋，当时的“尾张藩”，近期由于其市长河村隆之在公众场合屡次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表示其父亲在1945年日本战败时期居于南京，当时当地的中国民众对其父非常友好，“如果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怎么可能对我父亲如此友好呢？”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南京市和名古屋市中日恢复正常邦交的6年后，也就是1978年就结成了友好城市。名古屋所在的爱知县图书馆里，还特别有个角落叫“金陵书库”，由南京市赠与了许多中文图书，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在日华人都有受益。作为友好城市的最高领导，河村市长不知道为何要发表如此言论，搅乱中日关系。中国驻名古屋领事馆当即对其提出抗议，事后，南京市政府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的友好城市交流活动。这个事件，让不了解日本的中国人也知道了名古屋这个城市，名古屋在中日交流史上留下了一个不和谐的一瞬间。

然而，对中日交流史稍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中美邦交正常化，直接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中美邦交正常化，有一段“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的美谈。而这段外交史上赫赫有名的“乒乓外交”，其发生的舞台就是在名古屋。

1960年代末，美国经历了十多年越南战争，消耗了大量军备资金，造

成无法与苏联抗衡，国际地位也相应下降，希望能够联合当时两弹一星成功而国际地位大幅上升的中国共同抗苏。而中国，当时和苏联关系恶劣，也希望能够恢复和美国关系，进而恢复联合国席位。两个大国不谋而合，然而长期的意识形态隔阂，使得两国缺少一个合理的契机。

1970年9月末，日本乒乓球协会常任理事荻村伊智朗和当时的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爱知工业大学校长后藤钾二，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乒乓外交的建议。⁸

1971年，中国政府表示要参加当年3月28日到4月7日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已经两届没有亮相，时隔6年，再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和亲华议员西园寺公一协议，决定将台湾的中华民国从亚洲乒乓球联盟除名，解决中国政府最担忧的“两个中国”的问题。⁹1971年1月，后藤等人再次前往中国，和周恩来总理商议中国来名古屋参赛事宜。后藤决定将台湾从亚洲乒乓球联盟除名的决议，遭到了韩国，马来西亚的反对，只好辞去该组织会长一职。之后，日本决定退出亚洲乒乓球联盟，和中国政府共同创立了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后藤在之后4个月因病去世。可以说名古屋这次乒乓球大赛，为了吸收中国参加，后藤等人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¹⁰

1971年3月，中国代表团来日，作为会场的爱知县体育馆周围戒备森严，中国队和其他国家不同，入住了专门的酒店。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是不能接触的，稍加接触就有可能被认为是通敌的特务。4月4日，美国队队员科恩不小心坐上了中国队的巴士，当时的中国主力队员庄则栋主动上前和他握手，寒暄，并主动赠送他一块印有黄山图案的杭州织锦。科恩手握织锦下车的情景，被记者抓拍到，成为大赛的爆炸性新闻。第二天，科恩特地准备了一件印有和平标记和“LET IT BE”字样的运动衫，特地在中

8 源自日本朝日新闻“天声人语”栏目，1994年12月6日，第1页。《國際卓球連盟会長の荻村伊智朗氏逝く》一文。

9 「台湾除き中国招く・名古屋で開く世界卓球後藤協会会長が決意」毎日新聞 1970年12月31日

10 球が世界史刻む ピンポン外交：7（スポーツひと半世紀）朝日新聞1995年1月31日21页

国队必经之路上等庄则栋，回赠并与他拥抱。¹¹之后，美国代表团提出，希望中方能邀请他们去中国交流。庄则栋转达给了中国外交部。毛泽东最终同意此事，4月10日到17日，美国队得以实现来华交流访问。后来，通过巴基斯坦中介，美国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由于乒乓外交的推动，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数量由之前的32国，第二年一下变成了100多国。爱知县体育馆也成为了见证这一历史的舞台，笔者曾留学名古屋的南山大学，当时的开学典礼就是在爱知县体育馆举行，时隔多年，能出现在乒乓外交发生的同一场所，感慨颇多。

2008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问日本，特地和日本运动员福原爱在早稻田大学，打了一场乒乓球，再次成为中日交流史上的佳话。

接下来，本论文将着重记述明末清初，名古屋地区的一个不为人知的中日交流小高峰。

二 关于陈元赞

承接引文部分，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陈元赞的生平。

陈元赞(1587年～1671年)，原名珣，字义都，一字士升，另有芝山、虎魄道人、瀛壶逸史、菊秀轩、既白山人等别号、笔名，余杭人。是中国明清之际杰出学者，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陈元赞幼年好学，通诗文、书法、绘画、建筑、制陶及医术。二十七岁，入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术和制陶术，并负责管理寺内陶器、药材，对医药、针灸、气功、食疗都颇有研究。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东渡日本，在日流寓五十二年，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与各阶层、各行业人士广泛交往。在文学上，陈元赞将中国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在日本传播，对日本文学革新起积极作用。在武术上，于日宽文三年(1626年)前后居国昌寺创编柔道，传授给武士福野正胜、三浦义辰、矶贝次郎，以后三人各形成流派，使柔道传遍日本，陈元赞被日

11 莊則棟「伝説のチャンピオン、波乱万丈の人生を語る Vol. 3」、『卓球王国』2003年9月、pp. 84-89 同时参考了百度百科中“乒乓外交”词条的说明。

本人奉为柔道鼻祖。¹²

从这段介绍来看，这位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并不是非常出名的人物，对日本历史居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刚好笔者居住的爱知县，是陈元赟长时间居住，最后去世的地方，所以产生了对其进行研究的浓厚兴趣。然后，这一研究，又带出了几个一样在名古屋当地受当时的藩主德川义直器重的明代贤士，由于国内研究的人还比较少，希望能够在学术上有所贡献。



流传后世的陈元赟肖像资料不多，在日本和国内大概有两个版本，应该都是来源于上面这个江户后期出版的肖像集¹³，作者是栗原信充(1794-1870)，收入在一套肖像集5本中的第4本。

关于陈元赟，偶尔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被写作“陈元斌”，实为误作，可能电脑字库中没有“赟”(yun)字，所以用常用字“斌”来替代了，这边要先说明一下。

陈元赟的字“芝山”，位于余杭区闲林镇一带，陈出生于闲林镇陈家桥自然村。据杭州市余杭区地名志记载：该村人口有114人；因旧时陈姓人家出资造桥，桥名称为“陈家桥”，故此该自然村在当时便名为陈家桥村。

陈元赟其先祖陈与义（公元1090年-公元1138年），字去非，号简斋，河南洛阳人。北宋徽宗时任太学博士，南宋初，避乱岭南。绍兴元年（公元

¹² 笔者参考陈元赟的故乡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官方网站的当地名人介绍栏目的信息进行了编辑，http://www.yuhang.gov.cn/zjyh/rwfg/ldmr/ming/201305/t20130529_404107.html（2018年7月25日查阅）

¹³ 资料来源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公开数据，网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652?tocOpened=1>（2018年7月25日查阅）

1131年），在临安（今杭州），历官至参知政事，当时是位著名诗人。据《康熙仁和县志》载：其孙陈瓚，南宋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为仁和县令（今余杭区）。自此，落籍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陈家桥自然村。由此可见，陈元赞出生在一个史上出过名人的世家。¹⁴

陈元赞自幼刻苦好学，聪颖过人，才思睿智，多才多艺。十八岁时应县学生考试落榜，自此浪迹天涯，再未入仕途，以读书、书法、绘画、作文（曾有人录其诗文，著有《珊瑚枕》一书，署名为“崆洞子”）。由于陈家桥村临近以制陶为副业的缸窑桥村及自东汉至两晋烧制青瓷之地的瓶窑镇，为谋生计，陈元赞开始潜心学习烧制陶瓷技术，以维持生活。二十七岁时，陈元赞离开陈家桥村，到河南登封县少林寺学习武术，他苦心学习少林拳、衙役捕人术；管理寺内陶器，同时再度钻研制陶技术。在少林寺学武期间，陈元赞曾管理寺中药材。寺中的珍贵医药典籍和药材又引发了他的习医兴趣，有空便苦读医药书籍，钻研医道，所以他对中医、中药、针灸、食疗、气功都有一定的造诣。时年三十三岁的陈元赞，学业有成，在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来到日本长崎。

陈元赞一共活了85岁，这在几百年前，算是非常长寿的人了。33岁东渡扶桑，在日本渡过了50多年岁月。陈元赞是浙江人，1619年来到长崎，而江浙人的寺庙兴福寺建立于1620年¹⁵，此时陈元赞也在长崎，和兴福寺有交集的可能性很大。兴福寺后来的住持隐元禅师比陈元赞晚来日本40多年，但在陈元赞晚年的时候，曾在江户见面，当时正值隐元禅师见过幕府将军，准备回府，在品川宿欢送的时候，陈元赞也在场，之后赋诗七言一首。

七句重晤¹⁶

送摄州慈云山普门院龙溪僧，为隐元师来武州，陈情于幕下，事竣归山，兼呈大明诸友

14 关于陈元赞的家世，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无从考据，笔者引用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官方网站上的说明。http://www.eyh.cn/class/class_58/articles/92058.html（2018年7月25日查阅）

15 数据来源于兴福寺主页<http://kofukuji.com/contents.php?contID=1>（2018年8月13日查阅）

16『陳元贊の研究』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230

慈云一片日东飞 三扣侨庵说息机
二纪两遭灰劫变 七旬重晤故人稀
青莲望发图澄钵 黄柏须传临济衣
幸语中华诸法友 先容为我遵归依

另外，也有史料证明陈元赞和后来来日本的朱舜水也有交流。

陈和这两人来日本时期虽然相差巨大，但都是对中华文化在日本传播的重要使者。

1 长崎京都防长时期

关于陈元赞来日本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的政权更迭，避乱来日，还有一种说法是陈元赞死后约20年，1691年9月山边松引其言，说是科举落第之后，和贸易商一起赴日，从长崎上陆后，生了一场大病，等到病好之后，同船的已经抛弃他回国了，他只好留在日本继续疗养，“腰钞皆尽卒不得还”，只好以教书法谋生，其擅长的是赵孟頫的书法¹⁷。之后根据日本研究陈元赞的专家小松原涛的考证，陈元赞在长崎大概呆了两年时间。期间，书法方面有门人盲人书法家渡边梅峰。这个渡边梅峰后来担任阿部忠秋の右笔（江户时期的秘书职位），而这个阿部忠秋是武藏国忍藩藩主，后来被录用为老中（江户幕府下的最高官职，一般5人左右，首席老中相当于首相，可以理解为内阁大臣）。也许由于时间短暂，除此之外，很少有记述陈元赞在长崎期间有什么其他的贡献。

长崎的2年后，陈元赞人生出现了转机。当时倭寇犯中国东南沿海严重，中国朝廷派浙江道奉檄使单凤翔等50几人的使节团来日本，希望能解决倭寇问题。陈元赞作为临时翻译随从赴京都，虽只是短短三个月时间，但结识了日本著名的儒学家，德川家康的重要智库林罗山，此人后来是德川家光的老师（相当于中国古代教导太子的文官太子太师），参与制定了江户幕府时期的许多重要法令，为中国儒学在日本的推广做了很大贡献。

和林罗山同属藤原惺窝门下，和罗山，杏庵，活所并称“惺门四天王”的松永尺五，也是日本江户时代杰出的大家，对陈元赞的文才非常景仰，《尺

17『陳元賛の研究』 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58

五先生全集》中还收纳了这样一篇五言诗：

卒呈大明人元赞¹⁸

相遇异乡客 仪容心自融

诗誇曹植捷 文角马迁雄

贵罔儒弥显 吾民道不隆

兼葭连玉树 目击百无草

京都之后，陈元赞足迹出现在了长州藩。长州藩主毛利辉元手下有一明人唤作孟二宽（？—1657年），是陈元赞的杭州同乡，此人精通医术，擅长针灸，书法也有见长，也有学者推测陈元赞的医术是从孟二宽这边学来。孟二宽将自己的日本名改为武林次庵，这个“武林”姓也源自杭州旧地名。此外，孟二宽的孙子武林唯七，是经常出现在日本现代影视作品中，脍炙人口的“赤穗47义士”之一。

这一时期，陈元赞的主要贡献是为毛利辉元撰写《长门国志》，保存了日本本州西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民俗等方面的资料，传播了中国方志学，为日本日后撰写地方志提供了典范。

2 江戸时期

陈元赞进入江戸，是在来日本的7年后，也就是39岁之时，正值最盛之时。当时，在长洲藩熟识的曹洞宗僧人圭佐，在江戸建立了国昌寺（位于东京都港区，后烧毁，现为正山寺），陈元赞在该寺居住4年之久。在此期间，向福野七郎右卫门正胜，三浦与治右卫门义辰，矶贝次郎右卫门三位长州浪人传授了少林寺拳法。之后，日本柔术中重新确立了起倒流派，福野七郎右卫门正胜创立了良移心当流和（yawara）流派，三浦与治右卫门义辰创立了三浦流派，矶贝次郎右卫门创立了矶贝流派，由于陈元赞之后柔术的大发展，从江戸时期就有陈元赞是日本柔术鼻祖之说。

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爱宕神社里，立着一块日本安永8年（1779年）刻的石碑，标题为“起倒流拳法碑”，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拳法之有传也

18『陳元贊の研究』 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73

自投化明人陈元赞而始”。日本明治年间的汉学家信夫恕轩说：“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归化人陈元赞善此技，传之邦人，故此技以元赞为鼻祖。”另外，笔者居住的爱知县东部流传着一种使用棍棒的传统武术，是爱知县指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棒之手”（日语写作“棒の手”），里面也有一个重要流派叫“起倒流”。陈元赞人生的大部分是在爱知县度过的，不知道是否也有关联，尚待考证。

柔道是现代日本的国技，柔道和柔术有别，柔术是柔道，合气道，空手道的来源，特别是起倒流派更是其发展的起源。关于陈元赞是日本柔道鼻祖一说，现代日本也有学者有异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陈元赞对于日本柔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贡献。



拳法之有傳也自投化明人陳元贊而始而起倒之號出於福野氏而成于寺田氏寺田之後其傳一再至瀨野氏瀨野氏高平安人有故國流四方遂留東郡十數年從游如雲一時名於諸侯然獨究其奧者二人比留川氏以先達元贊而已晚至故瀨野氏之附屬者唯有應領而已新姓加藤名長正并後人從師而東我義數十年而業成則青之出處趨乘而連爾後弘業自任四十年于今弟子十有餘人固不乏人然聚散無常克己亦多方今繼志而授業於郡下者嗣子長英而外事理与翁無二亦不為不多其他及門升堂之徒今皆與其進而錄名字於陰若夫耆老之不如今則亡論已翁年已七十餘或恐百歲之後使西河之民疑夫子焉故輒述起倒拳法之所本自而勒石於東郡國福山寺以取證於後昆云

弟子免道元贊弟僕撰
東郡後字源 崎文雄 書并題額

安永八年己亥春二月丙辰朔九日甲子建
松橋中庵雲刻字

19

随着陈元赞声名鹊起，陈和江户大儒林罗山的交往也日渐密切。当时，居住于江户城的诸大名之间，争相宴请明人吟诗讲学，成为某种地位的象征。陈元赞也在此时，参见了仙台藩大名伊达政宗。之后，陈元赞人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发生了，陈终于得以有机会在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面前赋诗。这首诗现在没有流传下来，但一个异国文人在日本最高统治者面前赋诗，就奠定了陈元赞作为东渡日本的明末遗民重要代表的地位，也为之后长达34年的尾张藩主门人生活做了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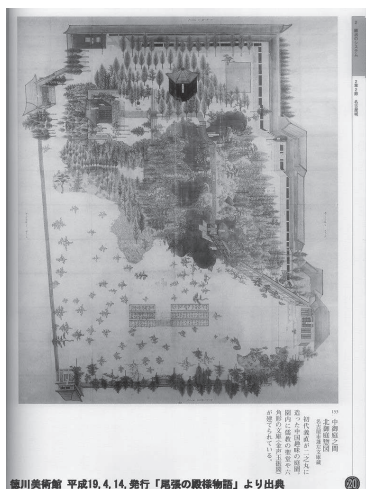
19 石碑和碑文图片引自论文『陳元贊の生涯と思想』，李丽，2017年6月，富士ゼロックス株式会社 小林基金 发行

3 尾张国时代

在尾张国生活的时期，是陈元赞人生的鼎盛时期，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寄居生活，开始了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器重的俸禄60石的门人生活。

尾张德川家，纪伊德川家和水户德川家并称“德川御三家”，在将军没有子嗣的时候，有继承将军位的资格，在诸大名中地位也特别高。陈元赞所辅佐的尾张国第一代藩主德川义直，是德川家康的第九子，庆长5年（1600年）在大坂（今大阪）出生，其母为山城国八幡神官志水宗清的女儿龟（相应院）。义直在7岁的时候，因为同父异母兄弟松平忠吉病逝而继承了藩主之位。义直在51岁的时候逝世于江户，其谥号是他本人预知自己将逝，和林罗山商议，定为“一品前亚相源敬公”。这个谥号是完全古代中国式的，有这样谥号的也只有义直一人，之后的藩主都是使用佛教的院号。²⁰从谥号就可以看出，德川义直是非常敬重中华文化的大名，陈元赞之所以会得到器重，才华得以发挥，也是和义直的明人重用方针分不开的。

德川义直年幼之时就师从林罗山学习中国的朱子学，一生保护和尊重流



落于日本的明末文人，名古屋地区此时能出现一个中国文人活跃的小高峰，其政策是首要的前提条件。德川义直后来聘请了藤原惺窝的高徒，堀杏庵在名古屋城内建造了孔子庙，并且铸造了许多中国圣贤的像。宽永9年（1632年），在林罗山的别墅内开设孔子学堂，将孔子和弟子像安置于内，题写了“先圣殿”三字匾额。²¹同时在名古屋城二之丸建造了中式庭园，园内特地建了一个六角亭，供奉儒学五圣人金像，取名“金声玉振阁”。

20 关于德川义直的身世，参考了『近世の瀬戸』p148，瀬戸市史編纂委員会編，1996年

21 开办孔子学堂事迹，翻译自『近世の瀬戸』p149，瀬戸市史編纂委員会編，1996年



陈元赞在德川义直的器重下，也发挥了许多才华，影响了当地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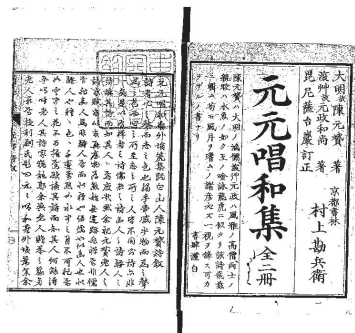
著作方面有对中国道教典籍的《老子经》所作的解说《老子经通考》，针对朱熹的《朱子家训》做的《朱子家训抄》。其中后者，面对日本民众进行介绍，涉及许多圣贤之道，人伦五常，封建社会的日常生活，家族制度规范，深受日本武士阶级子弟的喜爱。

现流传至今的陈元赞的代表作，还有一部和僧侣元政合作的《元元唱和集》。这里的“元元”来自两人名字中共有的“元”，是两人对诗成集。元政，俗称元政上人，京都人，是日本江户初期日莲宗的一代高僧，居住于京都深草，因而又被称作深草元政。元政从小好读书习文，特别擅长汉学。元政和陈元赞年龄相差很大，元政37的时候，陈元赞已经73，可谓难得的忘年交。²³两人同为奉行中国“三袁公安派”文学的文人，推崇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方式。元政最早是受陈元赞影响，而开始读公安派文学。元政作的《草山集》第三卷中《与元赞书》一文中写道：“数日之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广庄。诸篇识地绝高瓶史风流，可想见其人又赤牋之中言佛法者，其见最正余颇爱之，因足下言知有此书，今得之读之，实足下之赐也。”²⁴

22 中式庭园图和五圣贤图来自『尾張の殿様物語』p153 徳川美術館2007年4月14日発行

23 关于元政的身世，参考了京都深草瑞光寺主页。http://zuikouji.jiin.com/#_7 (2018年8月23日查阅)

24 《诗集 日本汉诗 第十三卷》富士川英郎 松下忠 佐野正巳编 汲古书院刊 p4



25

除此以外，陈元赞有著作《升庵诗话》，也被现代日本汉学研究者称为学古辞之起点。

当时属尾张藩下的爱知县濑户市，是日本著名的陶瓷生产基地，日语中的陶瓷就写作“瀬戸物”，说明其陶瓷业在日本近代的地位，现在的濑户市和中国的景德镇是友好城市。在此，陈元赞也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其作品水平很高，被当地人称作“元赞烧”。传说陈元赞早年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时候，学得制陶术，负责管理寺庙的陶器，但因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同时我们可以从陈元赞的故乡余杭区的历史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其故乡所在闲林镇附近历史上也有盛产陶瓷之地，如旁边还有个“瓶窑镇”的地名，有可能其少年就很早接触了这一制陶技术。



26

1974年12月淡交社出版的单行本《カラー日本のやきものの11 瀬戸》(中文：日本的陶瓷之11 濑户)中，该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陶艺家的加藤唐九郎（现在在名古屋市守山区还有加藤唐九郎纪念馆）有以下解

25 图片取自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图书馆。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89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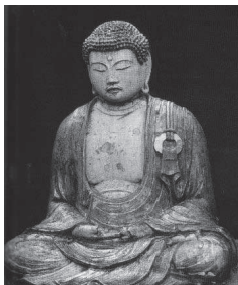
26 图片来自百度地图，杭州市余杭区的介绍。

说（概括的内容）。

初代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即位之后，采取了保护濑户制陶产业的政策，宽永年间（1624年开始）在名古屋城的外围北面，御深井丸之东北濑户山的茶屋一带开窑，用濑户祖母怀一带的陶土来制陶。地点大概在现在名古屋市名城公园游泳池一带。在此期间，陈元赞做出的作品被称为“安南染付风”瓷器，简化了器物的外形，涂上厚厚的釉，用吴须（酸化钴蓝）烧制发色。材料为濑户的粘土配上陶石。后来许多模仿这种制法做出的作品，被统称为“御深井烧”，但都无法达到陈元赞的那种蓝色。直到18世纪，在九州有田地区学艺后带回技术的加藤民吉才重新了这一技术。加藤民吉在日本被称为“磁祖”。另外，1953年泰文堂出版的《名古屋史迹名胜纪要》中讲到陈元赞当时也在自己家附近开窑烧制陶器，现年代久远，已无法考证。尾张濑户地区的釉药的变革，如果没有陈元赞的技术指导是不可想象的，濑户当地的史志也有说到，后世竞相模仿其作，充分肯定了陈元赞对于陶都濑户的重要影响。



陈元赞作茶碗（长谷川甫齐老藏）²⁷



28

27【陳元贊の研究】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326中有黑白图片，笔者从网上找到其彩图，檀木倶楽部通信 第2輯<http://red.ap.teacup.com/syumoku/img/1129709511.jpg>（2018年8月25日查阅）

28 同注27网络出处檀木倶楽部通信 第2輯<http://red.ap.teacup.com/syumoku/img/1129709549.jpg>（2018年8月20日查阅）

陈元赉作陶瓷佛像（名古屋市守山区大森寺藏，大森寺是为了纪念德川义直之妻而建，2018年9月15日笔者拜访该寺，和住持交谈得知，该佛像遭遇盗窃未遂，但已经损毁，现在只保存着佛像的残骸）

另外，德川义直之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为了给逝去的母亲春姬积德，命陈元赉烤制了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佛，供奉在名古屋城内，现在这尊佛像的头部被安置在日本静冈县的福泉寺内（地址：静岡県熱海市泉191-1），光头部就有约2米高，可以想象全身大小的陶像有多么的宏伟。



29

陈元赉不仅在武术，文学，书法，制陶上多有建树，还在建筑上对日本有一定的影响。笔者在前文列表的时候，有写道16世纪中期的陈元明同样在建筑上影响了日本。现在日本房屋外墙或者内墙有一种日语中称作“漆喰”（shikkui）的工法，就是用了石灰涂抹墙壁，达到墙壁多孔可吸收湿气的效果，非常适合日本岛国潮湿气候。这个石灰工法就是陈元明从中国引入日本的。“漆喰”（shikkui）发音就来自汉语的“石灰”，陈元明是江苏人，笔者推测是当时吴地方言的发音。

陈元赉在建筑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为去世的德川义直设计的中国儒教式墓所，位于爱知县濑户市定光寺内的源敬公庙，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级物质文化遗产。德川义直一生重中国文化，善待东渡日本的明人，前文笔者提到德川义直在生前选定自己的谥号为“一品前亚相源敬公”，是尾张藩主中唯一以中国式称呼为谥号的，其墓所也选择了中国儒教式。

29 一般社団法人 汤河原温泉观光协会主页<http://www.yugawara.or.jp/sightseeing/details.php?log=1364796410>（2018年8月25日查阅）

源敬公庙的建筑构成，模仿了中国儒教里的祠堂的建法。有狮子门，龙门，烧香殿，唐门等中式建筑，是江戸时期作为了解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料。



(被日本政府列为国宝级保护文物单位)



德川义直生前在名古屋城内设孔子学堂，一生推崇儒教孔圣，其墓所的牌匾也是台湾考试院院长，孔子第77代直系传人，末代衍圣公孔德成题写。



(狮子门)



(这种形式的门柱在中国到处可见，但在日本不多见)



(龙门)



(唐门，门后即为德川义直墓)

由于陈元赞一生对尾张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去世后，也被安葬于尾张藩祖的菩提寺建中寺，寺内还特地立碑歌颂其丰功伟绩。



上图为位于名古屋市东区的建中寺内的“陈元赞墓所”石碑。陈元赞墓后被迁移到名古屋市平和公园内，第七代尾张藩主德川宗春的旁边。



图为建中寺内歌颂陈元赞功绩的“高节千古”石碑，为尾张家第19代当主德川义亲侯爵撰写。

三 关于张振甫

江户时期名古屋的明朝遗民之中，不能不说的还有一位名叫张振甫的医生。

2012年2月10日，时任中国驻名古屋领事馆总领事的张立国携夫人拜访了张振甫的后人，并且向张氏家族墓所献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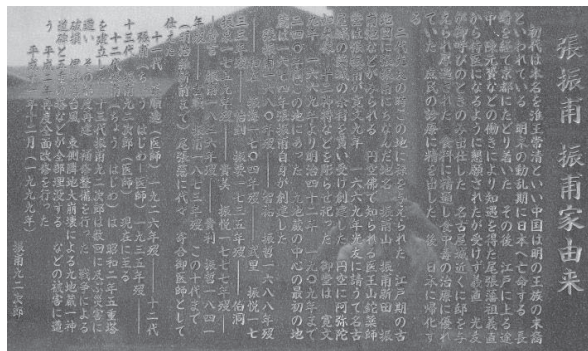


30

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去拜访其后人，不仅仅是因为其医术高明，为中日的医学交流做出了贡献，更不得不提的是因为其显赫的身世。

关于张振甫的身世也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南明政权下的淮王朱常清。明末动乱之时东渡日本避乱，一说是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的长子，也就是太子朱慈烺。被吴三桂拥立为帝，年号义兴，做过45天皇帝。也有上述两种之外的说法。

由于金庸《鹿鼎记》武侠影视作品在中国的流行，民众对片中天地会之“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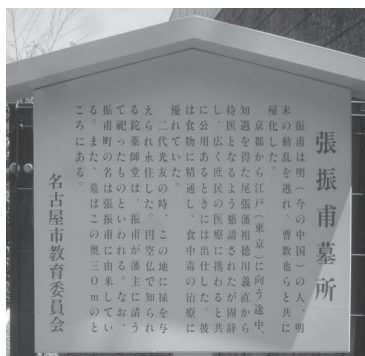
30 日本新华侨报2012年2月13日报道《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张立国夫妇拜访明末赴日移民张振甫后裔》

清明”，“朱三太子”比较熟悉，但很难预料，明朝的皇室会出现在日本的名古屋。

张振甫后人现在已经改姓为“振甫”。从张氏家族墓所1999年张氏后人立的石碑上的碑文《张振甫 振甫家由来》来看，现在的后人倾向于淮王朱常清一说。

但在1980年代，当时的张氏第10代传人张房雄整理家中资料，在台湾研究学者徐尧辉协助下，认定张振甫为明太子朱慈烺。一般史学家认为朱慈烺1644年病逝或者被多尔袞杀死。但是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徐尧辉著的《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一书有不同的见解。第十七章《唐舰三艘抵达长崎》中描述到，1647年（日本正保3年），明朝皇室后人一族360人乘坐3艘装有军事战备的“广东船”抵达长崎，船长船员都是葡萄牙人，江户幕府非常惊讶，接收了其中的近亲30人，其他逐回。幕府审议之后，考虑未来和清朝的关系，让尾张藩接收。这个事实，在内阁文库所藏的《正庆承明记》中有记述。荷兰的国立中央文书馆所藏的《荷兰商馆长日记》也有记录，刚好旁观到的商馆长记录在他日记中。

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认为张振甫为明末王公贵族成员。1647年（正保3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派人经长崎平户向日本幕府讨援兵。幕府招众大名议事，只有尾张德川藩和纪伊德川藩表示愿意出兵援助。³¹张振甫为尾



张藩主德川义直御医，陈元赞也是其重用之人。而且后面的史料也说明张振甫和隐元禅师有许多密切的往来，隐元禅师正是借郑成功之力经厦门江头港来到长崎³²，也有学者认为隐元禅师和朱舜水一样，是郑成功派来日本讨援兵的。这些史实之间的联系，也能说明张振甫非同一般的地位出身。

31「陳元贊の研究」 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123

32 隐元禅师留有诗歌《中左江头别诸子》，中左为厦门明代时称谓。

张振甫（1629-1680），字寿山，明代的名医。³³从图中名古屋市教育委员会设置的《张振甫墓所》标识牌，结合张振甫后人立的振甫家由来碑文可以读到，张振甫从京都往江户（今东京）途中，经陈元赞介绍，得到尾张藩祖德川义直的礼遇而来到名古屋居住。张振甫再三拒绝了德川义直让其作为他御医的请求，同意平时居住于名古屋城下，为一般老百姓看病，只有德川家有呼唤的时候才登城。张振甫精通饮食，擅长治疗食物中毒。旧版名古屋市史有记载，女性患者吃油炸饼引发腹痛，众医师束手无策，张振甫将香橙皮挤出汁令其服下，马上就治好了。

张振甫希望建庙宇为复兴明朝的义士镇魂，然而当时幕府对宗教管制严格，不允许新建寺庙。宽文9年（1669年），在尾张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的支持下，将已经荒芜不堪的上野村阳光院内（今名古屋市长千种区上野永光院）的药师堂移建，成为现在千种区日泰寺附近的铎药师寺。虽说是移建，但已经算是重建。按照明朝风格建成，由于张振甫医术高明，该庙被民众称为“医王堂”。³⁴另外根据名古屋市政府主页中“千种区史迹散策路”栏目介绍，铎药师寺大堂上供奉有十二神像，是各地行走造佛出名的圆空和尚用一把铎，和名古屋城建城时剩下的木材雕刻而出，寺庙名字“铎药师寺”正是来源于此。大堂内同时供奉着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³⁵笔者查阅佛教菩萨介绍，日光菩萨



和月光菩萨一般和药师佛关系密切，但同张振甫的身世，还有寺庙门口两个明朝皇陵前常见的文武官石人像联系起来，不禁让人联想到“日月成明”，是否和明政权有一些联系。

36

（铎药师寺大门，中国风格，门口有两个明朝皇陵前常见的文武官石人）

33【角川日本姓氏历史人名大辞典 23 愛知県】愛知県姓氏历史人物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角川書店 1991年10月30日 P506

34 建庙过程史实，参考了植木俱樂部通信 第2輯 <http://red.ap.teacup.com/syumoku/76.html>（2018年8月30日查阅）

35 名古屋主页中关于铎药师寺的介绍：<http://www.city.nagoya.jp/chikusa/page/0000000654.html>（2018年8月30日查阅）

36 图片来自《ACTIVE TIME》vol. 46封面 2012年1月23日 财团法人 名古屋公众医学研究所发行

张振甫后人一般都是医师，第十三代传人振甫久二次郎现在在名古屋大须当外科医生。

陈元赞和张振甫在当地影响大小，从现在名古屋市的一些地名可以窥其一二。

陈元赞终老之处的名古屋市东区泉3丁目一带，江户时期叫“九十轩町”，这个“九十轩”的日文发音（kujiyukuen）和陈元赞的号“菊秀轩”的日文发音一致，就是来源于此，应该是当地居民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文人而改。

而受张振甫影响的地名就更多了。名古屋市千种区有个振甫町，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名医。这个地区有人口近两千，当地有振甫中学，振甫保育園，振甫邮局，振甫游泳池等等。³⁷

同时，离振甫町不远处还有一个唐山町，据说也是因为江户时代的中国人居住于此，烧制陶瓷而来，不知道是否和陈元赞有所关联，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名古屋地区还是有不少中国人在此居住生活的。

四 关于曹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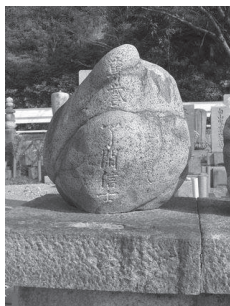
德川义直门下另外还有一位明代遗民，叫曹数也（?—1664），在茶道上有些贡献，这边也阐述一二。江户时代名古屋地区的明朝遗民，一般就研究到陈元赞，张振甫，曹数也这三个人，也许和对日本贡献大小有关，陈元赞的资料比较多，张振甫少很多，曹数也的资料就更少了。小松原涛的《陈元赞研究》一书中也许是对曹数也的描述最多的著作。

关于此人的来由也有几种说法，通常是认为曹是跟随张振甫一起来到日本，国统阐弘旅记中的《亡命志士传拾遗》中有记述：“曹数也亦扈从寿山之一人。通医学特长耳疾。平尾氏之祖。侍寿山歿于名古屋。传古老言外不详文献。”³⁸还有一种说法是经人介绍给德川义直，手岛益雄氏著《爱知县艺术家传》中有“尾张藩祖义直，浅野侯介之召抱”记述。浅野侯指的是浅野

37 名古屋市千种区区政府主页，千种区町名的来由栏目。<http://www.city.nagoya.jp/chikusa/category/73-3-4-0-0-0-0-0-0-0.html>（2018年8月23日查阅）

38『陳元贊の研究』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131

光晟（1617-1693）。³⁹曹数也传说是张振甫随从医生，擅长耳疾。在茶道上也很有研究。但真正出名，在日本留下名录的是他的后人，第三代，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都是尾张藩茶道名士，代代承袭“平尾数也”名号。根据收录了日本众多名人墓地资料的网站“日本扫苔帐”网站对初代曹数也和之后几代平尾数也的墓地介绍，可以了解到，初代曹数也在德川义直门下并没有什么职务，只是作为其说话对象，但是享受“切米五十石，扶持十口”的待遇。谥号“专誉了闲信士”，其墓志铭为“大明国人专誉了闲信士”。⁴⁰



41

其子兼弥从九岁时开始侍奉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专奉茶道。光友赐其姓“平尾”，取自“松平”和“尾张”各一字（德川家康旧姓松平）。第五代本名“原明”，用意即为“原本是大明国人”。⁴²原明之子，也就是第六代平尾数也，又叫心空庵吉章，在茶道上成就最大。根据名古屋市茶具古董店前田寿仙堂的介绍，第六代平尾数也师从山本道传，学习有乐流茶法，后作为“御数寄屋头”（江戸幕府官职，掌管殿中茶礼，茶器），培养了众多优秀茶道人才，当中有粕谷常斋，中岛円弥，由于其功劳显著，文政6年（1823年），被认定为“茶道格别功者”，特别升级为武士，在日本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⁴³

³⁹ 同38注。

⁴⁰ 名人墓介绍网站“日本扫苔帐”中的尾张藩茶人初代曹数也页。http://soutairoku.com/01_soutai/06-2_hi/09-1_ra/hirao_kazuya/sou_kazuya.html（2018年9月13日查阅）

⁴¹ 初代曹数也墓石，位于名古屋市千种区，上书“大明国人专誉了闲信士”，图片来源同注解40。

⁴² 日本扫苔帐中，第六代平尾数也的介绍。http://soutairoku.com/01_soutai/06-2_hi/09-1_ra/hirao_kazuya/sou_kazuya_rokudai.html（2018年9月13日查阅）

⁴³ 前田寿仙堂主页中“尾张藩的茶道——有乐流”部分

五 江戸时代尾张藩的中华物产店“狼屋”

除了陈元赞，张振甫，曹数也三人比较出名之外，同时期还有刘友林和林瑞云二人，出现在极少数《尾张名胜志》之类的当地书籍中。

刘友林，即兼康友林，据张振甫后人家传，张振甫东渡来日本的时候，携带了一明医，并非通常理解的曹数也，日本学者小松原涛对张家后人张贵之进行访谈的时候，张贵之否定了曹数也为擅长耳疾的随从医生之说，而只是一名掏耳屎的侍从，真正随从医生是刘友林。其后人也常沿用兼康友林名号，还有兼康定林，兼康友悦流传于尾张德川的《藩士名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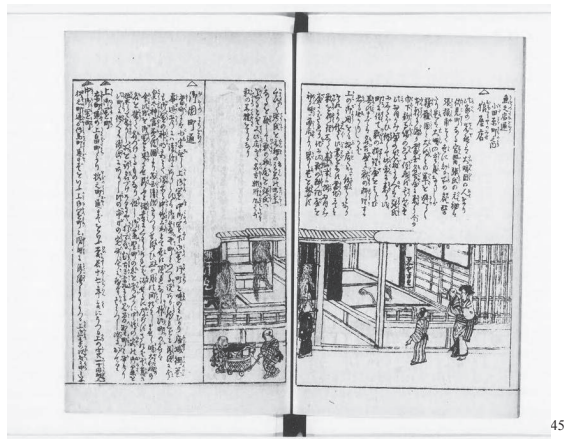
另外林瑞云也是归化日本的明医，但除了《尾张名胜志》有“林瑞云宗呈 大明人入朝止住本州名府为医业，曹数也中花投化而以医艺为业住于名古屋”⁴⁴的只言片语记录之外，已无从考证。

笔者在查阅尾张藩时期的华侨资料时，无意中得知，江戸时期尾张藩中竟然也有中华物产店，名唤作“狼屋”。现代华侨华人研究中，对中华物产店也常有重视，因为中华物产店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地华人有一定数量，经营也才有一定的受众，是当地华人兴盛的重要标识之一。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极其有限，笔者将得知的研究大致介绍一下，希望可以引发更进一步的学术考证。

“狼屋”，又俗称“四足屋”，“屋”在日语中是“商店”的意思，如“吴服屋”是和服店的意思。狼屋这个名字，体现了其饲养鸟兽，剥皮制药，鸟兽料理的职业特征。对日本文化稍有研究的便会知道，日本社会等级制度“士农工商”之下，还有一个“非人”的阶层，通常从事屠宰牲畜，制作皮靴之类的和“四足”动物有关的活动，这个阶层由于日本佛教不杀生，认为血是肮脏的观念，通常由最底层人，或者朝鲜过来的归化人进行。日本直到江戸时代之后，进入明治年间，民众才开始吃牛肉。这也是现代日本社会，烤肉店为什么大部分是韩国人或者已经加入日本国籍了的韩国人经营的原因。而古代中国人也和日本人不同，是吃动物内脏的，所以当地中国人数量到了一定程度，这个营生就变得重要起来。

44『陳元贊の研究』 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120

狼屋实际上就是张振甫的随从经营的，诀草的国乱亡命之人项中有“狼屋何某，料理人，名古屋肴棚住居”记载。了解尾张藩时代的社会民生的重要资料《尾张名阳图会》卷1中对狼屋有专门的记述，并且有绘图，是了解狼屋业态的重要依据。



笔者将上面的日语翻译成中文如下（从右往左）：

鱼店街小田原町之内 狼屋店（标题）

此家先祖是大明国人。伏见町官医张氏祖先张振甫是世人皆知的名医。张振甫是大明重臣，躲避鞑靼国（笔者注：满清）和大明军乱来到本朝，居于名古屋巾下新马场。狼屋店主祖上和张氏一同来本国，居住此町经营野兽料理店。当时名古屋还无野兽料理，该店经常被御用（笔者注：指德川藩主常用）。

之后代代从事此业。当地以野兽料理营生之商业仅限此家，其余皆被禁止。该店为表敬意，常向张氏送野兽料理。该店还有售外国野兽烧黑制成的獾肝丸。

下方的插图中，有“獾肝丸”文字的招牌，店头悬挂着几只狐狸模样的野兽。獾肝丸很有可能就是张振甫或者随从医生刘友林之作。从文字介绍可以看出，

45 图片来自日本国会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尾张名阳图会》卷1第23页。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144237>

狼屋和一般意义朝鲜人经营的“四足屋”不同，地位非常高，所以才会有尾张藩垄断经营野兽料理，尾张藩主御用店之说。据小松原涛1950年代对张家第八代传人张贵之的访谈可以了解到，狼屋除了进贡德川家之外，有每年正月送两头野猪给张家的习惯，狼屋的招牌为陈元赞题写，在之前不久还保存着。华侨出行，饮食是最重要问题，张振甫东渡日本也带来了狼屋店主，即厨师何氏。《尾州黄门御闻书》中讲到，德川义直帐下藩士何某和归化明人何某之间感情对立，上诉到法庭。德川义直特地叮嘱要秉公处理，不应偏袒日本人。⁴⁶ 笔者不禁联想此何氏是否即为狼屋店主何氏。

天保会记（五十）中有记载，鱼店街有狼屋，以野兽类解体为业，为归化明人朱舜水等人的厨师提供了原材料。⁴⁷ 此记述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张振甫和日本乞师的朱舜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自古“民以食为天”，狼屋也成为当时水户德川藩和尾张德川藩下的明人遗民们的一个联系纽带。

狼屋的业务除了提供野兽料理，肉类原材料之外，还涉及了提供打猎，赏玩的鸟兽，以及饲养时的用具。《桃源遗事》中有西山公喜爱的禽兽草木，许多从唐土输入的记载。年代也和德川义直重用陈元赞等明人的年代一致，所以可以推测狼屋此时发挥的作用。尾张藩除了重武道以外，当时盛行斗犬。斗犬好用唐土猎犬。狼，又称山犬，从狼屋的名号来看也可以推测当时也有狗类业务。《金城温古录》中有记载，名古屋城内御深井（陈元赞设窑之地）有唐犬饲养场，还有专人看管。《续岩渊》和《古老传》中还有德川义直公秘藏唐犬之逸事记载。庆安年间，大名诸侯间，尾张唐犬得有名声。《古老传》记载，德川义直有一名为“古芦”的唐犬，是天下无双的大唐犬，连狼都吃，为义直密藏。唐犬还经常被尾张德川家用于向外送礼，有水户德川家，松平城山守。宽文三年正月松平城留有记录“由井伊扫部头送来唐犬”，这个“扫部头”指的是直澄，是陈元赞好友元政和尚姐姐春光院之子。

名古屋市史制剂品栏目中有“黑烧 明传来 狼屋店”的记载，可以看出狼屋除了獭肝丸之外，还有制作熊胆，蛇类等供给民间。《尾张八丈》“商家

46『陳元賛の研究』 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120

47『陳元賛の研究』 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144

诸职”项中有“一兽物屋 小田原町狼屋次郎兵卫”，⁴⁸记录的年代为文政年代，因此可以认定狼屋一直到江戸幕府末年都被承继，延续到明治年间。

结 语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影响日本的过程中，除了通常知道的长崎，横滨等重要入口之外，名古屋地区在尾张藩时代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元赞，张振甫，曹数也以及其他的明代遗民在德川义直，德川光友两代藩主的重用下，将中华文明传播到日本。中华物产店狼屋的存在和唐山町地名存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华侨在名古屋地区的兴盛。名古屋同时也是中美“乒乓外交”的舞台，因此可以说，名古屋在中日交流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目录：

- 1『陳元贊の研究』 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 2『ACTIVE TIME』vol.46 財団法人 名古屋公众医学研究所发行 2012年1月23日
- 3『近世東アジア黒潮圏交流国際共同研究会報告書』平成17年—21年度 文部科学省科研費補助金特定領域研究 2008年5月
- 4『角川日本姓氏历史人名大辞典23 愛知県』愛知県姓氏历史人物大辞典編集委員会 角川書店 1991年10月30日
- 5 日本新华侨报2012年2月13日
- 6『尾張の殿様物語』徳川美術館 2007年4月14日発行
- 7『诗集 日本汉诗 第十三卷』富士川英郎 松下忠 佐野正巳编 汲古书院刊
- 8『陳元贊の生涯と思想』，李丽，富士ゼロックス株式会社 小林基金 发行 2017年6月
- 9 日本朝日新闻“天声人语”栏目，1994年12月6日
- 10 日本毎日新聞 1970年12月31日
- 11 杂志『卓球王国』2003年9月
- 12『近世の瀬戸』瀬戸市史編集委員会編，1996年

48『陳元贊の研究』 小松原 涛著 雄山閣 1972年 p146

网络来源：

- 1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 2 前田寿仙堂主页
- 3 檀木倶楽部通信 第2輯
- 4 名人墓介绍网站“日本扫苔帐”
- 5 名古屋市千种区政府主页
- 6 一般社団法人 汤河原温泉观光协会主页
- 7 杭州市余杭区政府主页
- 8 京都深草瑞光寺主页
- 9 长崎兴福寺主页
- 10 新华网
- 11 京都万福寺主页
- 12 《影响日本的明朝人》台湾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徐兴庆2016年8月3日论文
- 13 百度百科